

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特征的建构 ——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为例

袁梦遥

(武汉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以《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的副文本为语料,旨在挖掘并阐释英译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的构建价值,主要包括重构历史文化语境,促进跨场域情感共鸣,有效实现跨文化传播等方面。英译副文本研究既有益于拓宽翻译理论的阐释空间,也有助于深入理解操控和制约《浮生六记》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挖掘翻译文本内外的文化内涵和诗学价值。

关键词: 副文本;《浮生六记》;翻译;自传体

中图分类号: H 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01-0026-05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3.01.005

Construction of Paratexts in the Study of Autobiographical Prose —Taking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as an Example

YUAN Mengy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Business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aratexts of four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Chinese autobiography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aiming at the significance of paratexts in the narrative autobiographical prose, which includ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promotion of cross-field emotional resonanc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paratexts not only conduc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space of the translation theory,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deeper understanding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the autobiography,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oetic value of translation.

Keywords: paratext;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translation; autobiography

《浮生六记》由清朝沈复(1763—1825)所著,因其较高的文学意义和普适性价值,获得不少中外学者和译者的关注。《浮生六记》相关英译研究自进入21世纪后呈现稳步增长态势,近10年趋于稳定。国内研究主要涉及4个方面:翻译策略、译者研究、译本评析、理论分析。研究视角倾向多元化

切入,重视文内因素和译者的互动以及描写性翻译策略探究,而与正文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副文本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浮生六记》的4种译本均拥有丰富精美的副文本信息,但目前将4种英译版本的副文本进行对比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鉴于《浮生六记》的文学经典地位,在“一带

收稿日期: 2020-07-02

作者简介: 袁梦遥,女,助教。研究方向: 语言学与翻译。E-mail: yuanmengyao18@163.com

一路”“传统文化走出去”等背景下，深入挖掘《浮生六记》背后的闲情逸趣与文化价值，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译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杰拉德·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paratext）概念以及相关理论^{[1]-3}，深入探究《浮生六记》4种英译本的副文本结构与差异，挖掘隐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学意义，探讨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特征的积极建构，并阐释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的独特意义。

一、副文本与翻译研究

20世纪70年代，当代诗学和叙事理论研究者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首次提出“副文本”概念，将“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都归为副文本^[1]。另外，他还对副文本类型进行了详细区分，认为包括两大次类型副文本：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前者指封面、标题页、作者姓名、副标题、题词、前言、序言、注释、跋、后记、致谢、扉页上的献词等；后者则包括作者的日记、访谈、书信以及出版社的广告、海报等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1]5}。

随着20世纪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转向，译学研究开始超越语言学派的研究视野，将影响整个翻译过程的操控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范围^[2]。而在翻译的文本本身和翻译研究的外部资料中间，存在着第三种类型的资料，即“副文本”^[3]。1996年，芬兰学者科瓦拉首次将副文本（paratext）概念引入英美文学的芬兰语翻译研究，并指出“副文本对于翻译极其重要，它在文本与读者间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并可能影响读者的阅读和作品的接受”^[4]。其后，土耳其学者Şehnaz Tahir-Gürçaglar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副文本可以反映出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和看法以及出版商的意图^[3]。

国内副文本研究整体呈现由文学领域、语言领域向翻译领域扩展延伸的研究发展动向。综述表明，“翻译研究渐渐成为国内近五年副文本研究的新兴热点，是值得关注的重点研究动向”，副文本的主要阶段性研究热点有林译小说、现代文学、互文性和伴随文本^[5]。热奈特对副文本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创造性地把文本边缘纳入叙事学的考察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叙事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分析小说叙事结构也提供了新的批评工具^[6]。

总而言之，副文本研究是对文本本身研究很好的补充和扩展，将副文本概念和视角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拓宽了翻译理论的阐释空间，也有助于副文本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研究领域的扩展。

二、《浮生六记》及其译本、译作副文本介绍

《浮生六记》是清代乾隆年间人士沈复所著的一部自传体散文作品，原著共六记，分别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现仅存前四记。迄今为止，《浮生六记》一共有4种英译本，分别为1930年代林语堂译本^[7]（以下简称林译本）、1960年代雪莉·布莱克译本^[8]（以下简称布译本）、1980年白伦和江素惠译本^[9]（以下简称白译本）以及2011年格雷厄姆·桑德斯译本^[10]（以下简称桑译本）。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林译本完成时间约为1935年，刊登在英文《天下月刊》及《西风月刊》。1999年2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发行汉英对照绘图本，内有丰富的副文本信息，为《浮生六记》的广受推崇起了一定的铺垫作用。雪莉·布莱克（Shirley M Black）是英国女作家和著名汉学家，其翻译的《浮生六记》于196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原书的时间顺序和内容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进一步扩大了其海外知名度。白伦（Leonard Pratt）和江素惠夫妇合译了很多作品，企鹅出版社于1983年推出其合译版《浮生六记》，译文大量加注，文末还附有相关注解与图表。后（南京）译林出版社以汉英对照本将其纳入“大中华文库”进行出版^[11]并发行至今，保持了丰富的副文本信息，对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格雷厄姆·桑德斯（Graham Sanders）是加拿大汉学家。其译文于2011年由哈克特公司出版，译本依然有大量注解，文末则增添了人物关系索引、家族谱系等副文本信息。

目前对《浮生六记》英译本的研究有如下特点：第一，主要集中于翻译策略研究、译者研究和译本评析，研究内容有待深入；第二，研究视角相对单调，缺乏创新，有待开拓；第三，研究对象较为单一，单译本研究占据主体，缺乏更为宏观的全景式研究^[12]。针对后者，本文以以上4种译本的副文本

为语料,充分利用并挖掘副文本的有效信息及其与正文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副文本如何建构自传体散文特征,并阐释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的独特价值。

三、英译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的阐释与建构

从作品本身的文学体裁和形式来看,自传体散文在大文学生态中一直以来都处于较边缘地位。《浮生六记》作为一部自传体散文,以独特的叙述和描写、真实直率的感情流露和不经雕饰的语言在同类文学体裁中脱颖而出。4种译本历经80余年的时代变换,英译副文本不断丰富,与译文相辅相成,共同构建《浮生六记》的完整性和文学地位。本文基于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对《浮生六记》4种英译中的副文本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从历史文化语境的建构、跨越场域的情感共鸣和跨文化传播的便捷性三方面阐释副文本对自传体散文特征的建构意义和诗学价值。

(一) 历史文化语境的建构

自传体散文通常指作者以自身经历为素材,以自传的形式、散文的文风随兴所记而成的传记文学作品。自传体叙事最明显的特点是,通过自传主体的个体记忆叙事把读者带入到故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13]。本土文化读者对自传中的历史性描述具备一定的认知建构能力,但目的语读者很难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等差异准确理解文本内涵,因此出版方和译者构建的副文本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他们为重构历史文化语境的努力功不可没。

按文学体裁来分,认为《浮生六记》是自传体散文更为合适,比如在桑译本的封底名家评论中,多伦多大学教授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称其为“confessional prose”。布译本则倾向于以回忆录“memoir”相称,甚至更为直白地冠以副标题,“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凸显出原作的历史性和文学性。而白译本在序言中多以故事“tale”予以指称,未彰显出原作故事的真实性,却也没有否定叙事的可靠性,让读者在看似虚构的时空中感受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引发思考。

虽为自传体,但《浮生六记》原作并未按照严格的自传体规范写作,而是随性而作,其真实性不

免受人诟病。4种译本不约而同都或多或少地在译者序中强调,原作手稿“manuscript”是经由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发现,并交由王韬以活字版刊行于1877年。首先,历史上确有王韬这一人物,而非民间传说。其次,“manuscript”显示出原作来源具有真实性、可靠性,非杜撰或嫁接而成。这些字眼均放在了序言较为显眼的位置,或开篇或结尾,以凸显原作的真实性和历史性。而且,白译本在序言中还指出《浮生六记》中“引人瞩目的大胆直白之处”,便是讲述了大量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细节,而这些在清朝时期的官方文学中是鲜少透露的。这更加增强了《浮生六记》自传叙事的可靠性。林译也在封面标明沈复为“[清]”代人士,突出其身份的历史在场性。

对于原作故事的准确传达,译文任重道远。译者往往在译者序中表露自己对原作的理解与处理,以增强译文的可信度和合理性。例如,桑德斯将中英参考资料一一列举在目录首行的致谢部分,供读者参考。此举反映出他所参考的中文原著皆是比较经典权威的版本,因为原著出版社都以其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作风在国内名著经典出版领域拥有较高声誉。一方面其质量毋庸置疑,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桑德斯研读的是未被时势沾染过的史料,从而避免造成对原文理解的二次偏差。

桑译本的序言篇幅为4种译本中最长,内容也最为详实,相较于其他3种译本,桑译本对历史文化语境的重构最为深刻。其原因之一在于,它专门用了两个段落(346字)向读者介绍了沈复的家乡苏州的地理位置、历史人文、自然风光、方言特色、文化底蕴等一系列相关背景,宛如一幅介绍苏州万象的“清明上河图”。比如,苏州古称吴,向来盛产文人志士、商人和官僚阶层,文化氛围浓厚,但话语权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而便不难理解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沈复的悲剧并非个例,也并非偶然。桑译还梳理了故事的历史时间线,让读者对每一个章节的时间背景了然于心,使这段自述的历史更具真实性和逻辑性。

(二) 跨越场域的情感共鸣

《浮生六记》的经典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常情感的真实流露以及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人生感悟和悲欢离合,这极大地增强了其文学意义的普适性。“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浮生六记》是伴随着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他们肯定

自我存在价值,关注私人生活、私人情感,描写日常家庭生活,开创了自传文学的新局。”^[14]离散化和碎片式的自传体个体叙事具有独特的文本张力和想象空间,留给不同时代、不同个体丰富的阐释余地。为了吸引潜在的读者群体,出版社和译者便以副文本的形式给予不同程度的情感暗示和相应的背景介绍,从而实现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

标题是一部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具有较强的结构和释义功能,可以影响读者的预期判断和价值选择。4种译本的标题基本意义趋同,但也有细微差异。

(1) 林译: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2) 布译: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3) 白译: 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

(4) 桑译: Six Records of a Life Adrift

“浮生”一词普遍认为典出著名诗人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诗句:“……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实则最早起源于《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哲学信奉恬淡无为的人生,本意为“生时如浮游,死去如休息”^{[15]462},表达了无欲无求、恬淡宁静的生活态度。而后世事沧桑,“人生在世,虚浮不定”的含义成为“浮生”一词的主要标签,文人雅士多用此表达欢愉短暂、漂浮不定的人生感悟,而这正是沈复坎坷跌宕的一生。根据词典释义,“floating”和“adrift”皆有漂浮、不固定、流动的意义。前者侧重漂浮不定的动态过程,以及了无牵挂的情感依托,后者更强调漂浮不定、漫无目的,展示出一种随波逐流、身不由己的无助感。可见,即使一字之差,传递出来的情感共鸣其实是有一定差异的,这也是不同译本的魅力所在。

布译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巨大心理创伤后,西方世界试图从东方文学中寻到一丝心理安慰。在布译封面,副标题“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格外显眼,使作者的东方身份以及书籍的自传体特征昭然若揭,符合西方读者寻求个人情感寄托的需求。另外,20世纪,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李白、杜甫的作品对西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间接性影响,从而不难理解布译在正文前便通过引用李白诗句:“In the dream-like, floating life/how often are we happy?”(“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为读者抢先注入情感语境,使其更真切地感受沈复笔下的东方情感世界。在序言中,布莱克更多地以旁观者的

身份向西方读者展示了沈复的人生轨迹,提醒读者将其悲剧放到20世纪宏观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去考量,还指出他所面对的问题和压力不管何时何地都具有普适性。白译和布译都提到了沈复是失败的,但白译在序言中表示:“我们把最终判断权留给读者,但我们认为在发表最后看法之前,有几点需要大家铭记在心。”白译特意用独立几段向读者解释了沈复的悲剧因果,从个人层面延伸至国家层面,力图使读者感受到社会背景与个人命运的牵连性和必然性,从而引起读者共鸣。

桑译由于出版年份较近,在知识储备和参考资料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往往对原作的认识更为深刻、独到。比如,桑德斯曾提到一篇名为“*If Chen Yun Had Written about Her 'Lesbianism': Rereading the Memoirs of a Bereaved Philanderer*”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特定群体的注意,进而引发情感共鸣。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体意识、个人情感等关于人类自身的元素往往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这也是自传体文学作品与时代对话的枢纽所在,也是《浮生六记》得以不断复译的原因之一。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去,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吸收逐渐走上开放平等的正轨,但是跨文化场域的想象空间与现实依然是存在差异的。比如,中西方对于女性的地位认可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甚至迂回的过程。不同于林译序言和后记中对芸娘的第一人称直接赞许和倾慕,桑译对芸娘的短暂生平进行了重点概括,站在读者的角度将其娓娓道来,将情感天平交由读者自己衡量。

除了文字文本,图像文本在情感传递上一般更为强烈。封面画与书籍内容有很强的映射关联,旨在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插图一般是引用他人作品,起到图解、充实故事情节的作用,增强读者的情感体验。林译历经多次重印,外研社版的封面绘图人物勾勒线条分明,营造了一幅夫妇恩爱、悠然恬适的生活图景,情感氛围偏朴素平淡,但真实而具有感染力。林译插画众多,起到了很强的图解作用。布译版为鲜橙色背景,也是夫妇二人的生活日常画面,眼神细节更加传神。另外,布译在迎面页(facing page)详细列举了所引插图的出处、作者及页码。仔细观察,每幅画皆有题字,而画面内容与附近文本没有太多故事关联,但整体上给文本蒙上一层独特的东方美感。白译封面白底居多,仅一位女性角色独占封面,突出故事呈现以芸娘为主体。桑译封面为十分素雅的山水水墨画,由远及近可见

一位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垂钓人独在菰叶扁舟,形象地暗示了沈复漂浮落寞的人生,也给人物莫名增添了一份飘渺神秘感。白译和桑译插画数量均较少,相比白译小巧简单的画面,桑译插画内容整体与正文形成一个相互呼应的文—像系统。

(三) 跨文化传播的便捷性

世界文学的母题往往大同小异,但文化差异形成的理解隔阂是无法避免的。自传文学翻译重在传递一种叙事模式、情感表达、意识形态、集体和个体记忆,以及各种新颖的事物和概念^[16]。对于承载个体记忆的自传作品来说,副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文化交流层面上帮助读者补充文化背景,疏通文化障碍,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成功实现跨文化交流,甚至提升文化知名度。

广义的注释包括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多为作者或者读者为其他读者提供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介绍或者文化解释。作为副文本的一部分,在正文的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越是被反复注释的文本就越具有经典价值。《浮生六记》4种译本的注释随着时代推进变得愈加丰富和多元化。林译在副文本中鲜少有注释,多为译者为读者解释人物或者中文含义。但林译附有林语堂次女林太乙所作的英文序言,详述了林语堂的生平,展示了林语堂有意识地以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另外,在林语堂的序言中,可以发现林善于通过把握两种不同文化的共性来达到沟通融会东西方文化的目的^[17]。比如,他将沈复的安乐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安乐进行对比:“这安乐,我想,很像一个无罪下狱的人心地之泰然,也就是托尔斯泰在《复活》里所微妙表出的一种,是心灵已战胜肉身了。”不同背景的读者读至此必定豁然开朗,从而对沈复坎坷一生的理解更加通透。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更加广泛,桑译在序言首尾甚至还引用了庄子哲学,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加强读者对沈复自传叙事的理解,增强译文的感染力,例如:“He lives his life as though adrift and dies as though coming to rest(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出自《庄子·外篇·刻意第十五》^[15]。另外,桑译序言的语言风格极具时代特色,体现出桑德斯尽力使现代读者更贴近代中国的生活,感受中国文化的历史韵味。比如,以往译文均使用“Soochow”表示“苏州”,桑译用“Suzhou”代替,而且在序言中将上海作为参照物来指出苏州的地理位置,使沈复笔下的空间叙事仿佛跨越时空展现在现代人眼前。

企鹅出版社和“大中华文库”均采用的白译版本,其特点之一是副文本十分全面,内容具体详实,历史可考价值高,包括序言对慕友、歌伎等职业的历史背景补充、长达217条的注解以及地图和有关伪作的细节等。虽然《浮生六记》为沈复自传作品,但白译明确表示,他所描绘的那个时代的画卷“常常与文末这个时代的某些地方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即使文化背景不同,但它所具备的价值是超越文化界限的人类共同主题。不过,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大中华文库”的封面虽然利用黄河突出了磅礴气势,但传播功能稍显逊色。在其总序中,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长篇论述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浓厚底蕴。桑译对于翻译策略的注解篇幅最长,独立成篇,内容涵盖度量衡、日期、货币、地名、酒文化等专有名词的译法等。另外,文末还附有地图(沈复生活和游历的地方)、大事年表、沈复人际关系及家谱、沈复提到的历史人物介绍以及索引等。这些作为副文本的一部分,为读者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背景补充和文化解释,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跨文化传播。

四、结束语

翻译副文本研究虽然一直处于较边缘的位置,但其重要性不曾消减。本文通过对《浮生六记》4种译本的副文本(包括封面画、题记(引语)、前言、译序、序跋、后记、注释、封底图书简介、译作评论、插图等)进行考察,阐释了不同副文本在自传体散文特征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功能,主要表现于通过序言、后记等阐释性副文本重构历史文化语境,通过标题、封面画、插画等印象式副文本实现跨场域情感共鸣,以及通过注释等史料性副文本架起跨文化桥梁,成功实现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副文本与正文本相互依赖,相辅相成。鉴于《浮生六记》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副文本角度切入研究,是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对象,挖掘研究深度的一次有效尝试。

参考文献:

- [1] GENETTE G.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M]. translated by LEWIN J 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下转第37页)

- [25] 张莹瑞, 佐斌. 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6, 14 (3): 475 - 480.
- [26] HOGG M A, TERRY D J, WHITE K M. A tale of two theories: a critical comparison of identity theory with social identity theory[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5, 58 (4): 255 - 269.
- [27] 辛斌. 批评语言学: 理论与应用[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28] 辛斌. 语言的建构性和话语的异质性[J]. 现代外语, 2016, 39 (1): 1 - 10.
- [29] FAIRCLOUGH N.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30] 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 [31] BAKHTIN M M. Discourse in the novel[C]// BAKHTIN M M, HOLQUIST M.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59 - 422.
- [32] 曹海军. 城市政治学: 研究对象、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J]. 思想战线, 2013, 39 (6): 101 - 106.
- [33] 周杨. 城市政治学的三维视角[J]. 重庆社会科学, 2015 (12): 48 - 55.
- [34] DAVIDSON M, MARTIN D. Urban Politics: Critical Approaches[M]. London: SAGE, 2014.
- [35] 巴赫金 M. 文本、对话与人文[M]. 白春仁, 晓河, 周启超,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36] 巴赫金 M. 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 顾亚铃,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37] 李衍柱.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J]. 文史哲, 2001 (2): 51 - 56.

(编辑: 朱渭波)

(上接第30页)

- [2] 肖丽. 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 上海翻译, 2011 (4): 17 - 21.
- [3] TAHIR-GÜRÇAĞLAR S.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C]//HERMANS H.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44 - 60.
- [4] KOVALA U. Translations, paratextual mediation, and ideological closure[J]. *Target*, 1996, 8 (1): 119 - 147.
- [5] 殷燕, 刘军平. 国内副文本研究三十年(1986—2016)——基于CiteSpace的科学计量分析[J]. 上海翻译, 2017 (4): 22 - 26.
- [6] 朱桃香. 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J]. 江西社会科学, 2009 (4): 39 - 46.
- [7] 沈复. 浮生六记[M]. 林语堂,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 [8] SHEN F. Chapters from a Floating Lif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Artist[M]. translated by BLACK 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9] SHEN F. 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M]. translated by PRATT L, SUHUI C.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83.
- [10] SHEN F. Six Records of a Life Adrift[M]. translated by SANDERS G.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11] 沈复. 浮生六记[M]. 白伦, 江素惠,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 [12] 梁林歆, 许明武. 国内外《浮生六记》英译研究: 回顾与展望[J]. 外语教育研究, 2017, 5 (4): 53 - 59.
- [13] 王心洁, 谭源星. 论自传译叙中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构: 以莫言自传《变》的英译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4 (3): 157 - 162.
- [14] 王彦永. 《浮生六记》的文学体裁背景及其艺术成因[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4 (4): 143 - 146.
- [15]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6] 王琼. 鲍德里亚符号学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以当代西方商人自传译介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4 (3): 163 - 167.
- [17] 张季红. 浅析林语堂的文化态度与跨文化传播实践——以林译《浮生六记》的翻译为例[J]. 上海翻译, 2016 (1): 71 - 75.

(编辑: 朱渭波)